

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青年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 栾明梅 李小贞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断涌出的“农民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特色。受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而且他们所从事的强体力劳动实际上是对他们劳动力的掠夺性开发,中国的农民工转移呈现出青年农民工阶段性转移的特征,即青壮年时外出务工,中老年时返乡。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目的十分简单——赚钱以维持生计,满足生活需要,他们对生活多年的农村社区有较强的认同感,返乡之后通常仍然具有农业生产能力。但是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对生活的经历远没有他们的父辈那样深刻,同时,对长时间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具有感情,为城市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适应了城市的环境以及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对城市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他们有了更多的生活需求和情感诉求,这也是他们对于城市文明的认可。只是,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家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城市新移民能否融入城市,是影响社会安定与否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社会分层;青年新移民;社会融合

【作者简介】栾明梅(1986~),女,山东烟台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李小贞(1984~),女,河南鹤壁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学

一、社会分化理论回顾

(一)社会分层、分化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认为:社会成员特征如果按照类别参数如性别、职业、宗教、住地、工作地来分类,被定义为群体,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地位进行区分;如果按等级参数来分类,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被定义为地位。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就产生了社会分层。^[1]社会分层研究关注人们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和不均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而社会分化是对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发展过程的动态化描述,这种分化使社会空间中居于同一层次的个人或群体因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差别而发生类别或等级变化。社会分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横向的类别分化,又称为角色分化,核心是职业角色;二是纵向分化,即社会成员个人或群体的地位和等级差别,它又被称为垂直分化、等级分化或地位分化,通常地位分化的外在表征表现为等级性和社会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结构正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我国的社会分化日益深刻,社会各阶层的地位(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及关系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成长壮大。学者们对此开展了很多相关研究。如,李强曾经论证了在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关系。他认为,目前中心群体占有社会资源的特征显得愈来愈突出,边缘群体与中心群体的差距日益扩大,边缘群体利益严重受损,农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甚至农村凋敝,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分层制度、机制、分化程度、群体关系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各个阶级阶层自身的变化,社会阶层不断增多。^[2]李路路也指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原有阶层的“再形成”和新阶层的崛起,特

别是新阶层在社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于一个转型社会来说,如何将新分化出来的结构成分纳入到社会的核心结构中来,使之不至于成为边缘化和对抗性的疏离成分,这是原有的核心结构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性的实质在于吸纳新的成员将势必改变自身。^[3](李路路,2008)景天魁先生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即在当代中国社会,传统、现代和后现代这两个不同的东西,已压缩到同一时空之中。如,尽管我们仍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但发达国家在高度现代化之后才出现的后现代价值观,已经在当代中国青年中出现。这样,中国社会分层具有纵向和横向的双层特征,这种特征影响了青年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

(二)文化与文化堕距理论。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取向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渊源,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有着深刻影响。马克思·韦伯甚至曾经指出,中国未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文化。^[4]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 B. Tylor)将文化定义如下:“文化是一种复合物,它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能力与习惯。”^[5]文化的功能体现在对人的影响上,它能够促使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完善自身能力,不断促进自我发展。^[6]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文化堕距”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变迁中,属于文化范畴的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最为滞后,它不但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而且也滞后于社会制度的变迁。^[7]文化并不一定总是向主流文化、先进文化发展,亚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样,处于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中的群体就产生了分

化。青年文化是青年群体所具有的一切内隐的或外显的并且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规范和准则的总和。它是一种亚文化状态,是青年群体在价值观念、习惯、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综合反映或某方面的体现,是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产物,也是青年社会化的指导理念和重要内容。青年价值观的变迁过程是在价值本位上,青年由传统的以集体、重义轻利为本位向以个人、义利为重为本位转型。当代青年的价值标准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生产力标准超过了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标准,经济利益指标更为明显,其价值目标也开始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转型。它既具有对抗性、冲突性、正在进行性的对位特征,又具有接受性、继承性和可转化性的联结属性。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城市的新移民文化综合了青年的文化和农民工文化,呈现出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三)青年的社会分化及新移民阶层。对青年的界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对它进行界定,首先必须界定青年的本质是什么。近年来,社会学家从新的视角来对青年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的建构,他们将青年定义为人生生命历程或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主体将获得最主要的社会资格能力,作出那些影响他未来人生的重大选择和决定。青年的本质决定了青年阶段是一个接受教育,获得最主要的社会资格能力,并在教育、就业婚姻家庭方面作出重大选择和决定的阶段。青年实质上是社会化的一个阶段和向成人过渡,它是人的一个重要生命历程,对整个人生有很大的影响。第一,在社会变迁中,青年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又是社会变革的受害者。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在这种变革当中,青年作为最活跃、最易接受和产生新型意识形态的群体,是社会变革的先锋。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并不成熟,对新生的意识形态和变化的社会文化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就容易在指导自己的行为过程中产生偏差,产生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和社会化,并损害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化过程,阻碍社会进步、干扰社会机制正常运行的社会现象。第二,在变迁的过程中,青年的社会分化也日益扩大。随着改革的深化,青年群体内部综合经济水平、文化程度、就业岗位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出现等级式的阶层性质的不同小群体,即青年群体内部的分层。青年分化与社会整体分化的方向和轨迹基本一致,但也有其独特的属性特征。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其中的最具特色的群体。第三,农民工进城是农村居民的一种向上流动行为,他们是一个主动城市化的群体,有较强的适应和融入意愿,但无法得到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待遇,其社会地位居于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青年新移民也同样地处于这一位置,不同的是,他们大多数一毕业就来到城市,对农村社区没有很强的认同感。他们是一个有更强接受和学习能力、有着青年人特有的挑战与冒险特质的年轻群体;他们的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对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有更多向往和期待;他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大多不再需要为生存所忧,发展

性需求提高,公民意识初步觉醒,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第四,就财富的拥有而言,青年人并非优势群体。他们在工作经验、知识积累、人际关系资源方面并没有优势,尽管青年中的一部分知识高、能力强、人际关系资源丰富的人仍然具有较强的向上社会流动能力,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此方面的素质显然有待提高。此外,社会中的政策大多侧重于保护稳定就业的人,这显然无法覆盖到那些城市新移民。但是社会却常常忽略了对以上因素的考虑,对青年未来发展空间作出了过高的预期。

二、新移民及其社会融合

(一)新移民的边缘生活状态及其边缘文化。首先,城市新移民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通常被定义为一种“边缘化”的状态,新移民也常常被称为“边缘人”。他们的“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制上,指农民工被视为城市管理之外的人群,不享受城市体制内资源,而农民工又不可能也不愿意再参与农村的社会管理;^[8]二是城市生活的边缘化,指城市体系中,新移民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不足以支撑正常城市生活;三是文化涵义上的边缘化,是新移民处于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交界处,新移民在文化从属上充满困惑与矛盾。^[9]其次,新移民的边缘生存状态上投射到心理上,就表现在对所生活工作的城市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权利义务观念淡漠,缺乏对城市的热爱和责任感,进而与这个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市民产生一种疏离感。^[10]这些疏远感主要体现在抱怨情绪、农村归属感、被排斥感、不安全感 and 回乡成就感。针对青年新移民,有学者称他们为“双重边缘人”,即除了城市“边缘人”外,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农村和农业的依恋在减退,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社会,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作“候鸟型”的循环流动,呈现一种“钟摆”状态。^[11]再次,判断一个群体社会地位的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该群体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定。就其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而言,农民工选择进城务工是一种社会流动,这个群体在农村属于中上阶层而在城市却属于中下。由于体制上的隔阂,农民工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他们支撑了城市的发展,却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并受到歧视。一方面,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本身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另一方面,新移民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并不享有城市居民的一切权利,不仅在社会福利待遇方面与城市正式职工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在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社会服务的获取上,也与城市居民有相当大的差距。另外,将青年人认定为社会的优势群体可能会使青年产生不良的社会心态,加剧青年与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它人为地在青年中制造失落感和挫折感,促使一些青年产生急于求成,浮躁的心理,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不足,有的甚至为达到目标铤而走险。此外,这种过高预期也不利于代际团结,可能造成青年人与成年人争夺各种社会稀缺资源的状况,从而,造成代际关系的紧张。同时,优势群体的效应也会分散社会对青年的关注,影响社会问题的及时解决。^[12]

(二)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困境。首先,社会融合 (social inclusion)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

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任远、邬民乐, 2006)。对外来移民和主流社会的关系是对社会融合研究的主要方面,其基本取向包括“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麦格, 2007)。“同化论”强调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对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的抛弃。“多元论”则“强调不同种族或社会团体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李明欢, 2000)。可见,“文化融合问题”是社会融合问题的主要表现。其次,社会融合的基础是平等待遇和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大量的城市新移民是流动的主体,他们的社会整合也是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田凯指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的过程,流动人口必须要达到一定条件才能适应城市生活:他们要在城市有一份能够带来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相对稳定的职业,并形成一种与当地入接近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与当地入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以形成相同的价值观。他得出结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包括经济、社会、心理或文化三个层面(田凯, 1995)。而马西恒则提出了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可能依次经历三个阶段的构想,分别是“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需要政府、社区和新移民共同做出努力(马西恒, 2001)。这些研究都为社会融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再次,城市新移民正在逐渐失去他们的共同体,而呈现了一种游民化倾向。依附于家庭共同体是人的一种必需,尽管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共同体已不再具有多少整合力量,但人们仍然需要共同体。在农村社区,人们可以得到邻里的帮助。因为大家具有共同的利益和职业、一样并且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已经不存在了。即使仍然存在着血缘和纽带关系,人们也不能指望依靠家庭。地理上和阶级上的流动意味着他们不能再停留在自己所出生的地方、阶级和文化中,不再停留在父母所居留的地方。人口流动的影响,淡化了同村的利益关系,降低了与本村事务的联系与参与热情,削弱了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感。^[13]同时,新移民的愿望是融入城市,但是他们与城市之间却横亘着许多历史的、人为的障碍。他们缺乏有竞争力的技术,这使得他们在城市中失去了自己的优势。体制上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更给他们的融入设置了巨大障碍。他们已经离开农村,但是城市却不接纳他们,他们无法明确自己的未来,只能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之间。在文化融入上具有滞后性、渐变性和长期性、兼容性、差异性等特点,并存在角色身份错位、关系网络构建边缘化以及社区归属感模糊等困难和问题。

三、城市新移民的文化融合和适应能力分析

(一)新移民社会融入难的文化层面分析。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与当地居民相比,在心理、文化、身份和经济等层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其中,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较高,而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程度则较低。一是长期的体制性隔绝是导致新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难的首要原因。^[14]从文化层面上讲,市民文化构成了城市的主流文化,城市人一直都有中心区域的优越感,很多地方还很在乎自己的

城市传统,排斥外来人口,使得外来人口的融入十分困难。二是流入地的本土主义给新移民的融入带来了障碍,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技能和素质的低下使就业成为他们进城后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失去家庭支持后,多数人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他们无法建立经济基础,更无法形成与当地入接近的生活方式。其次是受业缘关系的局限,新移民社会关系的内向性、乡土性突出,与当地居民沟通交流较小,甚至只能与其他外来人员有共同语言。他们不愿主动突破这一封闭状态,客观上形成了自我隔离状况,与流入地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另外,生活观念、生活习惯改变难等等,都是横亘于新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巨大障碍。三是新移民如何融入城市社区,需要社会的努力,更需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他们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如果他们在受教育问题上得不到根本缓解,他们会成为新一代城市贫民,并且这种贫困将呈现代际继承的特征。新移民的知识文化素质存在着一定的先天不足。因此,要积极引导和激励新移民重视知识学习和经验积累,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职业技能,以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

(二)强化人力资本观念,支持青少年社会发展。新移民所面临的是一种以物质生活压力为基础的全面生存压力,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发展首先需要增强他们的社会能力。为此,社会应该建立人力资本和社会投资观念,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指导。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自由竞争的,人力资本不足的个人,因为受教育程度低、工作能力差,就业经验不足,往往会削弱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造成其工作报酬偏低,个人及其家庭陷入贫困而依赖社会求助的可能性因此增加。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地区而言,教育都是减少贫穷,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在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如果缺乏教育,个人和国家都不能有效应对以高技术为取向的经济环境变迁。但是,目前教育救济体系无法覆盖所有需要的人,在农村,尤其是农村地区,教育投资的长期性及效益的滞后性使很多家庭望而却步,许多地方仍然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80后”的新移民大多接受了初中以上教育,但是受过高等教育和正规职业教育的很少,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Grubb总结了多国对弱势青年人的教育及训练计划,认为有效的计划要适当混合正规教育、职业技术训练、工作中学习三种不同的训练形式而且成功的计划是真正能整合三者的优点。实施合理的人力资源战略,切实加强对于青年的培养的社会效用非常大。强化人力资本观念就是要采取多种措施推进青少年的教育,包括保障青少年的受教育权,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弱势青少年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加大政府教育投资开发社会资源,调动社会机构和组织的积极性。尤其要加大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源投资教育和救助,避免出现子女培养上的误区,防止贫困的代际沿袭。对参加培训的新移民应当有个别的支援服务,如给予他们辅导和实习的机会,鼓励他们不断地自我完善,有条件的还可以深造,提高自身发展的能力。

城市新移民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农民从流

我国汶川特大地震的特点及其防震措施探索

□李永红 高照良

【摘要】地震是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最为危险的自然现象。它在短短几秒钟内突然降临,令人难有机会逃生。除了生命的伤亡,它所造成的损害也要花上许多年才能恢复。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的严重性构成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地震的巨大社会破坏力,使其成为公认的最具恐怖性的自然灾害之一;重大灾害性地震的发生,除在特定区域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民众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压抑之外,并易诱发形形色色的非常态社会心理,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稳定。本文阐述了地震分布,实录了建国以来的大地震,论述了汶川特大地震的特点、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及对我国的危害程度,提出了防治地震的措施,意在唤起人们对地震危害的重视及因地制宜地采取防治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将地震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关键词】地震;自然灾害;防治措施

【基金项目】本文系“科技支撑计划研究课题”(编号:2006BAD25B09)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永红(1971~),男,陕西永寿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建学院博士;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方向:水土保持工程研究、土力学原理对水土流失机理分析
高照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一、我国的地震分布

地震是地球内部介质局部发生急剧的破裂,产生地震波,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地面振动的现象。地震(earthquake)就是地球表层的快速振动,在古代又称为地动。它就象刮风、下雨、闪电、山崩、火山爆发一样,是地球上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大地振动是地震最直观、最普遍的表现。在海底或滨海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能引起巨大的波浪,称为海啸。地震是极其频繁的,全球每年发生地震约500万次,对整个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大地震由于突发性强、伤亡惨重、经济损失

巨大,往往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对于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造成巨大冲击。因此会引起社会、政府乃至国际上的高度重视。同时,一次地震的破坏区域虽然有限,有感范围却很大,波及面广,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些都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对社会生活和生产有重大影响交通、通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输油等工程系统称为生命线工程,强烈地震可能使桥梁断裂、路面开裂下陷、铁路扭曲、电缆拉断、管道破裂,也可能使发电厂、变电站、水库、大坝、配气站、油库、自来水厂、电信局、电视台、电台等

动到定居到融合最终成为市民应该是市民化的基本规律,但是中国的新移民却出现了“流动但不定居,定居但不融合”的现象,^[15]究其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及新移民素质和文化水平偏低所致。因此,除努力减少流动障碍、完善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之外,更应强化人力资本观念,不断增强新移民自我发展和适应能力,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彼特·布劳;王春光译. 不平等与差异性[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2. 李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J]. 北京社会科学, 2008
3. 李路路. 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J]. 社会, 2008
4.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5. 米切尔. 新社会学词典[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6. 李琦. 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J]. 理论探讨, 2003
7. 孙璐. 论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J]. 理论月刊, 2006
8. 田凯. 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 社会科学, 1995
9. 张敦福. 城市农民工的边缘地位[J]. 青年研究, 2000
10. 朱考金. 城市农民工心理研究——对南京市610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J]. 青年研究, 2003
11. 胡书芝, 吴新慧. 生存在边缘——对青年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社会学分析[J]. 青年探索, 2004
12. 唐斌. “双重边缘”: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2
13. 吴鲁平. 优势群体, 还是优先群体?——变动世界中青年社会地位的一种跨文化比较研究[J]. 青年研究, 1999, 6
14. 德鲁克. 社会的管理[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15. 李春玲. 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J]. 江苏社会科学, 2007, 2